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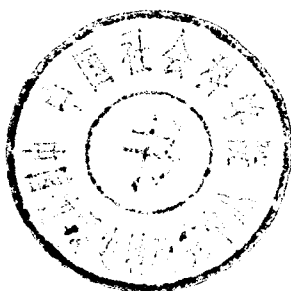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民族史译文集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
一九八一年

22.9083
144
110



目 录

契丹勃兴史.....〔日〕松井等著
刘凤翥译 邢复礼校 (1)

黑契丹.....〔苏〕B·B·巴托尔德著
李一夫译 (51)

关于女真社会史研究
的若干问题.....〔日〕松浦茂著
刘凤翥译 邢复礼 蒲瑞元校 (59)

金代女真氏族的构成.....〔日〕松浦茂著
邢玉林译 邢复礼校 (69)

附：读松浦茂先生《金代
女真氏族的构成》附记.....陈述 (96)

公元三——四世纪胡人在中国境内
的分布及其社会结构.....〔苏〕Л·И·杜曼著
李锡厚译 李佩娟校 (97)

附：第11期目录预告..... (68)



1
5
3
5
®

契丹勃兴史

〔日本〕 松井等 著

刘凤翥 译 邢复礼 校

〔译者按〕契丹源出东胡，为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早在魏收的《魏书》中即有专传对契丹进行记载。《隋书》、《新唐书》、《旧唐书》也有契丹传。

唐代末年，中原纷乱，藩镇割据。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也乘机统一各部，进而建立了几乎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的时称契丹时称辽的王朝。

契丹从在历史上出现，为什么过了五百多年的时间才建立王朝呢？在这五百多年中，契丹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如何呢？辽王朝建立的内因条件和外因条件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契丹民族史领域中至今犹应探讨的课题。

松井等的《契丹勃兴史》一文从契丹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着眼，概括地叙述了契丹建国前的五百多年的历史，并着重讨论了契丹王朝勃兴的外部原因，文章虽撰于数十年前，但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经常被契丹史研究者所引用。

目 录

- | | |
|------------------------------|-----------------------------|
| 一、序言·····(2) | 九、安史大乱后幽州方面的
状况·····(18) |
| 二、隋代以前的契丹·····(2) | 十、安史大乱后契丹附奚的
状况·····(20) |
| 三、隋代的契丹·····(4) | 十一、奚契丹同回纥的关
系·····(25) |
| 四、唐朝高祖和太宗时代的
契丹·····(5) | 十二、契丹的勃兴和耶律阿
保机·····(27) |
| 五、唐朝高宗和则天武后时
代的契丹·····(8) | 十三、耶律氏和大贺氏遥及
鞞氏·····(30) |
| 六、唐朝玄宗开元年间的契
丹·····(10) | 十四、耶律阿保机的建国和
汉人·····(33) |
| 七、唐朝玄宗天宝年间的契丹··(13) | |
| 八、安史大乱之间营州方面
的状况·····(16) | |

一、序 言

在古代东蒙古之地兴起的部族很多，例如东胡、乌桓、鲜卑和契丹等等就是其明显者。其中能够成为一个大国，把东从中国东北、朝鲜，西到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结成最亲密关系的莫若是契丹即辽国^①。契丹之名出现于后魏时代，其事迹最初见于《魏书》。

在内蒙古东部有称为西喇木伦的大河，其下游入辽宁省成为辽河。唐代以前叫做作乐水、饶乐水、弱洛水、如洛瓌水，唐代以后称做潢水、袅罗个没里、世里没里，这些都是指现在的西喇木伦河^②。后魏时代，契丹住在和龙之北数百里之地，自成部落（《魏书》卷一百契丹传）。和龙是现在的朝阳县，其北数百里则当在西喇木伦之南。现在朝阳县以东的义县西北一里多地的大凌河左岸有万佛洞，在洞内的刻文^③上记载着后魏的使者赴契丹途中经过此地的情由。如果根据该刻文考证，在后魏时代，契丹的住地是在西喇木伦河的南方，特别是其根据地可以认为是在现在的绥东县（小库伦）地方。契丹本是游牧之民，随寒暑逐水草，以畜牧畋渔为业，以车马为家，辗转迁徙无宁居处，或向南移动而居于白狼水（即现在的大凌河）之滨，或复向北占据托纥臣水（又叫土护真水，西喇木伦河的南支，现在的老哈河）。

契丹之所以迁徙无常，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游牧民，实际上是由于经常受到强邻的压迫。

契丹从最初的部族集散不定到后来逐渐地部族集结固定，这正是从后魏初期到唐代末年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契丹经常受到强邻的武力压迫。最大的压迫是来自南、北两个方面。契丹介于南北两大势力之间，因此之故，长期不能伸展其力量。在它北面先后有蠕蠕（柔然）、突厥和回纥；在它南面先后有后魏、隋和唐。契丹要等到两方势力中的一方或双方衰微的时候，才初步获得活动的自由和勃兴的运气。除了南北之外，在东西方也有较长期地阻碍契丹发展的势力，如东方的高句丽和渤海，西方的库莫奚等都是。本稿的目的是在考证后魏以来契丹同强邻的关系如何变迁，从而论证契丹在唐末勃兴的原因。

二、隋代以前的契丹

后魏的威力达到西喇木伦河流域即所谓松漠的地方是太祖道武帝时候的事，特别是在登国三年，帝讨库莫奚，“至弱洛水南，大破之，获其四部落，马牛羊豕十余万”（《魏书》卷二太祖纪和卷一百库莫奚传），获得显著的成功。库莫奚与契丹同种，在西喇木伦河上游地方至老哈河一带游牧，最初与契丹杂处，后来分开，东西为邻。库莫奚大败，契丹也受到影响，《魏书》契丹传所说的契丹也同时被魏军驱逐，以致“与库莫奚分背”，就是这时的事。

其后十年，后燕都于和龙，又过了十一年，后燕被北燕所灭，又经过二十七年，北燕被后魏所灭，和龙之地尽为后魏所有。这是后魏世祖太武帝太延二年之事。北燕灭亡的那一年，后魏在和龙置营州（《魏书》卷一〇六上地理志），作为威制东北诸部的根

据地（《魏书》卷一〇〇库莫奚传），因此，契丹和库莫奚都屈服于后魏的威力。

如果说在南有后魏兴起，那么在北方则有蠕蠕（柔然）出现，两者发生冲突的同时，契丹一方面受到后魏的威胁，另一方面又感到蠕蠕的压迫。蠕蠕至其王社仑时成为大国，其领地东到朝鲜（《北史》卷九十八蠕蠕传），社仑与后魏的太祖道武帝是同时代的人。神䴥二年，后魏的世祖太武帝大破蠕蠕而至粟水（现在在蒙古的克鲁伦河），以后因为太平真君四年和十年的北伐，大破蠕蠕而挫其势。起先，神瑞元年，北燕未亡之时，社仑之子斛律与北燕王冯跋和亲（《北史》卷九八蠕蠕传），蠕蠕的领土东接朝鲜即使有夸大之嫌，至少难以否认蠕蠕对西喇木伦河流域有着利害相关的联系。当时的契丹有暂时归服北燕的形迹（《魏书》卷九七冯跋传），从这点也可推察出蠕蠕的威力。后来北燕灭亡，蠕蠕也被太武帝击破，然而蠕蠕仍不失为威胁契丹方面的一大势力，它东与高句丽相通，以致达到割取契丹西北的地豆于国的程度。

后魏道武帝时代，在高句丽出了有名的广开土王。到了其子长寿王的时候，国势颇强，其领土的西境到达辽河，大致以辽河与后魏为界。因此，那时对契丹来说，高句丽也成了一大祸患是当然的形势，及至后魏孝文帝大和三年，“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軼，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魏书》卷一〇〇契丹传）。这是患高句丽的胁迫而请求后魏保护的情况。

太武帝以后，后魏同蠕蠕的对抗尚未断绝，孝文帝太和十一年之时，有称为高车的部族叛蠕蠕而通后魏，蠕蠕的势力暂时被挫。及至熙平元年，蠕蠕破高车，国势复强，然而其强势并不长，遂被后魏所威制。正光二年，后魏把蠕蠕分为东西二国；正光三年，袭击背叛的西部并消灭之；正光四年，讨伐背叛的东部并击破之。于是蠕蠕衰弱，后魏独强。及至其后十余年，即永熙三年，后魏分裂为东西二国才大杀其势。东方的高句丽在后魏分裂之前的三十年间，就频繁地与新罗和百济作战。北魏分裂后六年，在新罗出现称作真兴王的英主，把其疆域向北推进，逐渐蚕食高句丽。高句丽的国势虽没有因此而衰弱，但也不能和以前广开土王和长寿王时相比。

北方之强蠕蠕先衰，南方之雄后魏依次分裂，对契丹来说，自然减轻了历来的压力。因此，后魏分裂十九年之后，契丹犯北齐之北边，文宣帝起军亲征，这实在是由于压力减轻，契丹稍稍得到活动自由的结果。这次亲征是天保四年进行的，文宣帝亲征至平州（现在在海关之西的卢龙县），分两路进军北伐，在营州之地大破契丹^①。

蠕蠕还未明显衰落时，对契丹来说，成为更大祸患的劲敌是在更北方出现的突厥。契丹犯北齐却被大破的前一年即天保三年，突厥的首长土门杀死蠕蠕的头兵可汗，自号伊利可汗。天保四年，土门之子木杆可汗把蠕蠕向南方驱逐，到了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全部并有蠕蠕的故地（《北史》卷九八蠕蠕传），其势渐盛。《北史》卷九九突厥传说：“俟斤又西破厥咄，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这也是木杆可汗时的事情。木杆在位二十年而卒。至其弟佗钵可汗，愈益强盛，中国的北齐、北周二国争着与结婚好，“齐人惧其寇掠，亦倾府藏以给之。佗钵弥复骄傲，乃令其徒属曰：‘但使我在南两个儿（指北齐和北周）孝顺，何忧无物邪！’”从这里也可以想像得出他的倨傲之态。处于现在在蒙古方面的契丹、奚、霫诸族势所必然地雌伏于突厥之下亦

极易窥知。在佗钵时代，北齐被北周所灭。又过了四年，北周被隋所灭，这几乎是与突厥的佗钵可汗卒、其甥沙钵略可汗立同时的事情^⑤。

三、隋代的契丹

隋代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强盛，其势力自然而然达到现在的东蒙古方面。当时，在作为东蒙古东边的要地，靠近契丹住地的营州（和龙）有刺史高宝宁者，他从北齐之时经北周而至隋初，长期据有营州之地，甚得华夷之心。隋初，高宝宁^⑥联络契丹和靺鞨而背叛隋朝。开皇二年，率突厥之众攻入北平（平州），突厥也大举入寇。开皇三年，隋之幽州总管阴寿率军从卢龙塞出兵北伐。高宝宁向突厥求救，当时突厥正在现在的山西北部与隋的大兵决战，无暇东顾，因此，高宝宁难敌阴寿之兵，弃城而走，接着奔契丹，遂被部下所杀。营州地方至此全部为隋所有，隋和契丹从那时开始，才有了互相接触。

隋朝占有营州之后没有多久，契丹向隋请求交易。开皇五年，其主多弥贡方物（《隋书》高祖纪）。契丹一般仰服于隋的势力，乞求隋朝允许他们住到营州以北的故地（《隋书》卷八四契丹传）。只是突厥正在气焰方强，东方的高句丽也作为大国足以威制辽河平原，契丹被高句丽和突厥胁迫，契丹的“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向隋〕内附。……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隋书》契丹传）。虽说契丹蔓延到托纥臣水（现在的老哈河）方面，号称东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但那时是以托纥臣水东方的松冈岭^⑦与奚（库莫奚的简称）为界。

突厥之胜虽然强大，然而始终存在着不能同隋对抗的情况。沙钵略可汗立，从弟大逵便心怀不平，沙钵略乃把他立为阿波可汗，使其别领突厥之一部。但沙钵略又非常妒忌阿波的骁悍，开皇三年，乘阿波入寇隋的北边败归之机，袭击其部落^⑧，大破之。阿波无所归，乃奔西方向达头可汗求救。达头可汗是沙钵略的从父，一直镇守突厥的西面，其势凌驾于沙钵略之上。于是达头援助阿波，其他强酋也与沙钵略有隙，相率而归阿波。阿波占有从金山（现在的阿尔泰山）地方到天山方面^⑨，其西得到达头可汗的援助，以至与沙钵略互相攻击，这是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分的端绪。阿波与达头的联合，是沙钵略的大患。沙钵略苦于此事，只好屈膝归服于隋，欲藉隋的援助破阿波，直到开皇七年死去，从未怠慢对隋的贡献。在他被达头所苦之时，又畏惧东面的契丹，因为契丹杀死了沙钵略派来的监督者^⑩。由此可见，那时的契丹积蓄了多少引人注目的势力。沙钵略归服隋朝之后，契丹也认为与其雌伏于突厥，莫若仰仗于隋的势力。

隋朝方盛，东西突厥都被威制。沙钵略可汗死后十二年，即开皇十九年，启民可汗由于隋的保护而即位，直到他死的十一年间，不敢抗隋。及至大业五年，启民之子始毕可汗立，形势又为之一变。始毕立了三年之后，隋炀帝进行了第一次高句丽远征，又过了一年，再次远征，又过了一年，进行第三次远征，然而三次远征都没有效果，对外失坠了威信，对内招致人心的动摇，隋国的崩溃之兆也在此时呈现出来，从而促使突厥产生了南侵之心。因此，在大业十一年炀帝北巡之际，始毕可汗大举入寇，把炀帝围于雁门（现在的山西省代县），炀帝得援军虽免于难，然而此后三年，隋朝即亡，割据诸雄多向北臣事突厥，始毕可汗之势颇炽。过去畏惧沙钵略的契丹至是又呈现出既受东方高句丽威胁又受西方突厥压迫的状态。

四、唐朝高祖和太宗时代的契丹

迨至唐朝代替隋朝统一中国后，得以讨平隋末割据的群雄。在群雄之中，割据现在陕西北边的梁师都依靠突厥的庇护，坚决与唐朝抵抗，唐高祖也忙于建立国内的统一大业，在此时也只好曲意待突厥甚厚，因而突厥骄傲，颇有轻唐之色。唐武德二年，始毕可汗死，第二年，其弟颉利可汗立，当时始毕之子什钵苾号突利可汗统治突厥的东边，主宰契丹、靺鞨等东方诸部族^①。武德元年和二年之时，隋末的纷乱尚未平定，唐高祖亦无余力向契丹方面伸展，契丹多次掠边境，寇平州（《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如今突利可汗主宰突厥的东面，契丹、奚、霫诸部族又呈现出屈服于突厥威力的状态。武德三年，梁师都诱突厥入寇之时，“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侵扰幽州（现在的北京）方面（《新唐书》卷八七梁师都传）。武德五年，“契丹寇北平”（《资治通鉴》卷一九〇，武德五年十月条），其间，契丹大酋遣人来朝（《新唐书》卷二一九契丹传），虽说武德六年，“其君长咄罗遣使贡名马、丰貂”（《旧唐书》契丹传），然而直到武德九年唐高祖退位，太宗即位之时，唐的威力还没有达到现在的东蒙古方面。

唐太宗即位后的数年间，突厥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颉利可汗之政令失宜，国人渐渐离叛，统治下的诸部也多有背叛，其中薛延陀，回纥等最为强大。太宗贞观元年（公元六二七年），回纥大破颉利之兵，颉利愈趋衰弱。再加颉利与突利反目，遂相攻伐。贞观二年，突利向唐求救，唐又遥怀薛延陀之酋长夷男而结纳之，颉利之势愈益穷蹙。同在贞观二年，契丹酋长摩会（《新唐书》契丹传。《辽史》卷六三有“隋、唐之际，契丹之君号大贺氏”。《册府元龟》卷九七七把摩会写作“大贺摩会”。）率其部落降唐，这也实在是因为突厥分裂，其势大衰，突厥对契丹以下东方诸部的压力从而松弛的自然结果。颉利乃向太宗请求，愿以梁师都换契丹，太宗断然拒绝，契丹归服唐的状况没有什么变动。

贞观四年，唐军大破颉利可汗并俘虏之，突厥完全瓦解，臣服于唐。同年，“营州都督薛万淑遣契丹酋长贪没折说谕东北诸夷，奚、霫、室韦等十余部皆内附”（《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八月条），这实在表明突厥瓦解的影响。代替突厥而成为北方强者的薛延陀势力渐渐增长，贞观十五年，大举侵扰唐的北边时，“上命营州都督张俭帅所部骑兵及奚、霫、契丹压其东境”（《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十一月条），由此看来，唐的威力也渐渐到达现在的内蒙古东部，营州就是现在的朝阳，在这方面可以推察出唐的经略根据地的状况。

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唐太宗举兵远征高句丽。同年七月，营州都督张俭奉皇帝之命以侦察敌状为目的先向辽东时，契丹、奚诸部之兵也召来以从张俭（《新唐书》卷二太宗纪，同书卷一一一张俭传）。贞观十九年，太宗亲征辽东，安市城之战无效而还。同年十月过营州，召见契丹酋长窟哥，授与他左武卫将军，慰劳其部人（《新唐书》和《旧唐书》的契丹传）。太宗伐高句丽，另外把兵陈于北边以防薛延陀的南侵。薛延陀果然乘唐太宗东征之机南侵，被击退。贞观二十年，薛延陀被唐军所破，全线崩溃。高句丽也仅安市一战获胜，以后再三蒙受唐军侵袭之苦。唐的威力愈益显示伸

向今日的东蒙古之势。

贞观二十二年，唐对契丹的经略，终于达到引人注目的发展之时。是年，契丹酋长窟哥向唐请求内属，太宗“乃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无极县男，赐姓李氏”（《旧唐书》契丹传）。首观二年，契丹君长大贺摩会（见前之注）来贡，《辽史》卷三七把“窟哥”写作“大贺氏窟哥”。窟哥恐怕是作为摩会族人而为契丹君长的。在窟哥的部落置松漠都督府的同时，以其别帅七部为八州，以其酋长为刺史。七部八州是把达稽部作峭落州，独活部作无逢州，芬间部作羽陵州，突便部作白连州，芮奚部作徒河州，坠斤部作万丹州，分优部为匹黎州和赤山州，八州都直属于松漠都督府（《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又在这一年以契丹的别部纥便部为弹汗州^⑧，又乘别部酋长曲据^⑨归服之际，以其部为玄州。窟哥除做松漠都督之外，还担任“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新唐书》契丹传）。所谓十州就是七部八州外加弹汗州和玄州。

唐代关于契丹诸部设州之事并不一定始于贞观二十二年，从高祖武德年间即已实行，放在贞观二十二年之后的也不是没有其例（参照《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条），仅仅是设都督府、授契丹大酋以都督，借以表明内属关系始于贞观二十二年。这种内属的关系就是所谓羁縻的关系。羁縻^⑩就是在服属于唐的诸部族中设立名义上的州县，其部落大的称都督府，以其大酋做都督或刺史，皆世袭其爵位，由唐的边境地方官监理之。突厥，党项、吐谷浑、回纥、西域、南蛮等皆以这种方法管辖之，契丹亦从同例。

现于此就契丹部落的数目和名称略作一考证。在后魏时代出现的契丹诸部的名字有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黎部、黎部、吐六于部（《魏书》契丹传）。在隋代称契丹“分为十部”（《隋书》契丹传），其名称不详。到了唐代，其君大贺氏所率的八部（《新唐书》和《旧唐书》契丹传）最为显著，八部就是窟哥的部落和别帅七部的合称。但八部之外所见的内稽部、乙失革部、松漠部、乙失活部（都见于《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契丹州十七府一”之条），李去闾部（《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营州都督”之条）等名也必然是契丹，但不是从直属于窟哥的八部分出来的，而是另外存在的若干部别，可以认为窟哥属下的八部是契丹部族中最强大的集团。此八部想来应在所谓隋代的十部之中，至于它与后魏时代出现的八部有什么关系尚不详。在贞观之后的玄宗开元年间，八部仍有生命力，从玄宗开元十二年把“绢绵八万段分赐奚及契丹”之时的敕书中有“奚有五部落”、“契丹有八部落”（《册府元龟》卷九七五、九七九）等语可以知之。然而关于八部的名称却有不同的说法，即把它们作但利皆、乙室活、实活、纳尾、频没、内会鸡、集解、奚嘏之说见于《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契丹传。《五代会要》卷二九、《文献通考》卷二四与此相同。《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把“频没”作“濒没”，《契丹国志》初兴本末把“但利皆”作“祖（一本作‘徂’）利皆”，把“乙室活”作“一室活”，《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开平元年考异引《汉高祖实录》把“但利皆”作“利皆”，把“乙室活”作“乙失活”等小的差别，实际上都与《新五代史》的记事相同。这些名称盖在唐末出现。《契丹国志》卷二三说到八部后来更改名称，《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后梁开平元年考异常常用年代久远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因此，关于唐代契丹八部的名称前后的差别只不过是把它们转换了一下说法。虽然“乙室活”与贞观年间的“乙失

活”相同，然而前后八部的内容是多少有些差异的。《辽史》卷三四兵卫志说：“大贺氏中衰，〔八部〕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倘若果真是这样，可以推察出唐初的八部同唐末的八部在内容上多少有些变动。只有前八部全部灭亡之后才新兴起后八部之说大概是有可疑之处。

松漠都督府初置之时，其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换言之，契丹君长窟哥那时住在什么地方呢？窟哥的住地也就是所谓契丹牙帐。经营游牧生活的契丹，牙帐的位置难免时常变动。贞观二十二年之后的四十八年就是则天武后的万岁通天元年，此年契丹叛。关于营州失陷之事（此事后面还说），《旧唐书》则天纪中载为“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姊城州刺史孙万荣杀都督赵文翊举兵反，攻陷营州”。由此看来，那时松漠都督府（契丹牙帐）在营州城附近。窟哥之时，也有牙帐在营州附近的形迹。在此之先，唐高祖武德四年，契丹别部酋长孙敖曹内附，唐命他居于营州城傍（《旧唐书》契丹传）。到了孙敖曹的曾孙孙万荣，与李尽忠叛。孙敖曹的子孙唐初以后常期住在营州附近。另一方面，作为松漠都督的契丹君长有一些从贞观二十二年以后也同样住在营州附近，遂至双方联合攻营州。这与《文献通史》卷二四契丹传说松漠都督府置于营州的记载相合。以后契丹的牙帐逐渐移向西北，这在后面论述。

契丹与其西邻奚族虽然经常发生矛盾，然而在外敌的压力下，两者的境遇是相同的。奚也是游牧民。唐代，其国依土护真水（现在的老哈河）西边大洛泊（见《新唐书》卷二一九奚传。现在兴安岭之西的经棚县西附近有达里泊），东以冷陁山（见前）与契丹为界。唐的威力逐渐到达东北，奚也与契丹同靡于唐，其大酋苏支从太宗远征高句丽有功（《新唐书》奚传）。唐设松漠都督府的同时，也以奚的君长可度者为饶乐都督^⑤。都督府位于现在的西喇木伦河上游的巴林桥（古代所谓潢水石桥）之傍（见《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九三页饶州之条）。奚五部^⑥改称为五州。阿会部为弱水州，处和部为祁黎州，奥失部为洛瓌州，度稽部为大鲁州，元俟折部为渴野州，以其酋长为刺史（《新唐书》奚传），凡此皆同于契丹之例。

唐朝把奚和契丹只称为两番^⑦，常予以同等待遇。因此，虽然设立了松漠、饶乐二都督府，契丹和奚都被唐朝羁縻，然而监视和统治这两个部族的任务是由东夷都护兼营州都督承担。营州是联络唐本部同辽东方面交通线上的要冲。在地理上占有经略东北根据地的形胜。不仅奚和契丹，所有东北诸番先经营州都督之手控制之，成为必然之势。在营州背后的策源地是幽州（现在的北京），营州处于掩护以幽州为据点的唐的东北边境的位置。关于经略东北诸番的根据地，如果营州失守，代替它的就是幽州，史迹证明了这一点，此事后面还要论及。《新唐书》奚传说：“置东夷都护府于营州兼统松漠、饶乐之地，置东夷校尉。”营州都督负有统制奚和契丹之任，特授以东夷都护。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贞观二十二年不作东夷都督，而是说置东夷校尉官于营州。《文献通考》卷二四契丹传中是“东夷都护”，未作“东夷校尉”。在营州设置了东夷都护或东夷校尉之职。《新唐书》奚传两种官职都设置的记载是值得怀疑的。试想唐太宗远征高句丽之前，张俭是营州都督兼护东夷校尉（《旧唐书》卷八三张俭传），护东夷校尉和东夷校尉如果是一回事，那么是职设于贞观二十二年以前，而且是由营州都督兼任。以后东夷校尉虽改称东夷都护，然而两者毕竟是相同的。高宗永徽六年，程名振“累除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旧唐书》卷八三程务挺传），这也是东夷都护由营州

都督兼任的证据。《通典》卷二〇〇契丹传说贞观二十二年设置松漠都督，紧接着在营州置东夷都督以统松漠、饶乐之地，罢东夷校尉之官。据此则东夷校尉改称东夷都护也与设置松漠、饶乐二府的时间相同。从而可以说前边《新唐书》奚传及《资治通鉴》的记事是错误的。我认为护东夷校尉（东夷校尉）在晋代也有（《晋书》卷九七夫余传、马韩传）。后魏时代，后魏授与高句丽王这种官，称“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魏书》卷一〇〇高句丽传）。唐也置之，改称东夷都护。后来高宗灭高句丽，置安东都护以治其地，安东都护盖为东夷都护之后身。

五、唐朝高宗和则天武后时代的契丹

唐高宗永徽五年，松漠都督李窟哥抵御高句丽的攻击，把它大破于满城（参照《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三九二页）。显庆三年，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以契丹之兵大破高句丽。李窟哥歿，契丹与奚一起虽然暂时叛唐，然而显庆五年，竟至发生了松漠都督阿卜固被唐兵所擒的大事^⑧，八年以后，即总章元年，唐朝终于攻灭了劲敌高句丽，建立了安东都护府，唐的威令广及于现在的中国东北，契丹也随之呈现出颇为平稳的状况。

太宗、高宗时代，唐的威力如何遍布于四周的异民族是无需细说的事情。安西、单于、安东、安北、安南五都护府（则天武后时代，又设北庭都护府，合起来共六个）在边外保持唐的威力的时间较久。然而到了高宗晚年，呈现出关于皇后武氏宫中异变的征兆，高宗歿后，武氏被称为则天武后，一覆唐的皇室，唐朝对内对外的政策都发生了动摇，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几乎在发生这种动摇的同时，在北方塞外，突厥的动乱复起，逐年加深了唐的外患。突厥被太宗征服投降，散居于唐的北边的很多。高宗时代，北边无事二十多年，其间，突厥恢复了势力，复又占据漠北之地，再次呈现出南侵之兆。调露元年（高宗死的前四年），突厥煽诱奚和契丹侵营州。从高宗末年，突厥首领骨都禄频繁地骚扰北边，接着到了则天武后时，骨都禄卒，默啜立，逐渐呈现出其侵害之患的状况。

突厥的叛离，招致唐的北边一带的动摇。武后长寿二年，在契丹之北仰仗突厥的室韦^⑨叛乱，显示了这种动摇的一个方面，如奚和契丹也窥伺着或早或晚动乱的机会。室韦的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三年之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六九六年）暴发了契丹的叛乱，武后朝廷感到很大的痛苦。是年五月，契丹的松漠都督李尽忠（李窟哥之孙）与其妻兄孙万荣一起从营州城旁起而为乱，陷营州而据之，他们是由于对营州都督的处置抱有不满意而如此的。武后遣二十八将讨之，讨伐军大败，孙万荣作为叛军的前锋侵入到长城以南^⑩。十月，李尽忠虽卒，孙万荣代之，兵势甚强，进而蹂躏河北之地。第二年即神功元年三月，讨伐军又大败，更加恐慌，到了六月，孙万荣在战败的时候被其奴仆所杀，契丹的叛众逐渐受到挫折。在此动乱方起之时，突厥首领默啜请求帮助唐朝讨契丹，袭击契丹的背后，捕去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妻子。武后传令嘉奖，授与他立功报国可汗之号。孙万荣在营州西北四百里之地设新城，把老弱妇女、器仗资财留于此处，亲自南征之时，恐怕突厥威胁其背后，乃派使节到默啜处结同盟，默啜不应，却袭击新城而陷之（《资治通鉴》卷二〇六）。孙万荣之兵虽然进入南方，但听说此事产

生危惧之念。乘此机会，唐军与叛入契丹的奚人呼应袭击契丹，遂把孙万荣消灭。这样一来，契丹的叛乱由于突厥从背后威胁之而镇压下去。现在考察一下事情的前后，这次契丹之乱最初是由默啜煽动起来的，他为唐朝讨伐叛乱原非本意，而是企图在这次叛乱中对唐朝北边的其他地方进行侵掠，于是才把契丹煽动起来与唐作战，进而威迫契丹屈服，这不外是想扩张突厥的势力而已。关于乱后的形势，《旧唐书》契丹传说：“自是，其余众遂降突厥”。同书突厥传说“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后，常受其(突厥)征役”。这应是必然的结果，而且以后唐朝忙于对突厥的北边警备，没有能力注意于东北方面的经略也是势不得已。

契丹暴动渐渐收敛，唐朝却进而迎来了劲敌突厥。孙万荣死后的第二年即圣历元年，默啜可汗掠长城之南，骚扰河北之地归漠北，恃兵威强大，甚有轻中国之心。过了两年即久视元年^①，有契丹降将李楷固者，奉武后之命袭击后来渤海的始祖大祚荣，却大败而归，契丹越发脱离唐朝而附突厥。这样一来，以前治柳城（即营州）负有直接统制契丹责任的营州都督也从万岁通天元年以后不能居旧治，圣历二年^②之时，寄治于幽州管内渔阳城（现在的北京东北），领有渔阳，玉田（与现在的玉田同）二县。原来隶属于营州的羁縻州也在契丹暴动的那一年或第二年移治于南方的内地（多在黄河以南），是等至神龙元年虽又北还，但在那时，脱离了营州都督之手，进而隶属于幽州都督^③。至是，营州都督几乎全部失去旧时的职责。神龙以后，幽州都督虽负有羁縻契丹之任，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施以直接制裁，仅仅致力于遥控而已。总而言之，万岁通天元年之变以来，唐朝久失营州之旧地，后来直到玄宗初年才再度恢复之（此事后面会论及），唐对契丹不能执行积极政策的同时，对于契丹的后援者和制裁者突厥，却不得不经常用心。

神功元年，狄仁杰上书说，强张国威于塞外是不得策的，劝说皇帝只慎边境的守备，待敌人来犯予以痛击，废安东都护府之类的机构，专门致力于充实辽西防备（《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他的上书也叙述了关于处理北方塞外属地的意见。他认为，在西边应罢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在东边应废安东都护府，主要的是对北方的塞外民族可专守防御之策。他的意见虽未实行，但有识之士认为是对的。当时唐朝的士气不适于对北方民族采取活跃的进取政策，因而希望从速恢复以前对契丹的优势是不能的。

乘唐对东北经略的萎缩，特别是对契丹羁縻的弛缓，新的渤海国得以在东方崛起。其始祖大祚荣（粟末靺鞨人），在万岁通天元年契丹暴动之时，与乞四比羽一起从营州附近向东逃走，渡辽水去寻求根据地。暴动结束之后，久视元年，契丹降将李楷固奉武后之命先击乞四比羽，斩之。接着讨大祚荣，却大败而还。大祚荣占据东牟山（参照《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四一〇页），集合靺鞨之众和高句丽遗民，势渐强大，自号震国（振国）王，遣使与突厥结交。后来在先天二年（开元元年），唐授与渤海郡王，因此把国名改称渤海。渤海建国的情况，在这里不详述，在别的地方还有叙述它的机会。只是应该说一下其国没有遭遇多大的困难就得以新在东方崛起，并非仅仅因为其地荒远，实在是因为契丹和契丹的后援者突厥妨碍了唐的威力，渤海国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就容易了，大祚荣先通好于突厥也暗示了轻视唐的威力这件事。《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渤海传都说，李楷固败还之后，契丹愈益依附于突厥，道路阻绝，王师不能讨大

祚荣。一语道破了当时的实情。唐朝经略的萎缩期间，渤海国当然越发强大和富裕，唐不能以武力制压之，觉得白白地傍观着它是不利的，到了中宗之朝，采取招抚它的策略，如据《旧唐书》渤海传所记，契丹、突厥连岁侵扰北边，使命不达，其策未能完全实行。

神龙元年则天武后死，唐中宗复位，经睿宗而至玄宗开元元年的九年间，唐对北方的经略，依然在徬徨不振的状态。优柔寡断的中宗之朝，发生了悍妇韦后之乱；睿宗也不是敢作敢为的人，对外经略不仅不振，却苦于对突厥的处置，只不过持因循之策而已。中宗命内外诸官各上破突厥的策略之时，卢甫上书说，今时“利在保境，不可穷兵”，敌人“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看来这些意见是适合皇帝意图的，从中亦可推察当时一心一意讲求专守之计的状况。

到了睿宗末年，长久的因循态度由于个人的勇气一度被打破，其结果只不过是幸而加深了唐的屈辱。营州旧地由于陷于契丹之手，东北的经略主要委于幽州都督之手。薛讷久在幽州，从事边防，并不是“未尝举兵出塞”（据《资治通鉴》卷二一〇，《唐书》卷一一一和《旧唐书》卷九三薛讷的本传）。先天元年三月，罢薛讷幽州都督，孙佺代之。孙佺骄傲地说：“薛讷在边积年，竟不能为国家复营州。今乘其无备，往必有功”（《资治通鉴》卷二一〇）。于是他率步骑二万八千远征军，以攻击奚和契丹为目的向北挺进，同年六月，与奚的首长李大辅之兵在冷陁山附近冲突。唐军战不利，溃退，李楷洛、乌可利二将军虽幸得脱归，然而孙佺和将军周以悌却成了俘虏，经奚酋之手押解到突厥的默啜可汗的跟前杀之。孙佺无谋的随意行动只是白白地暴露了唐代威力的缺陷。玄宗即位是这次失败两个月以后的事。同年十一月，“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大掠而去”（《资治通鉴》同上），也是受到这次失败的影响。

六、唐朝玄宗开元年间的契丹

则天武后时代，随着唐朝制御契丹政策的失败，突厥的默啜可汗的势力强大起来，成了唐的劲敌，以致威制长城以北诸部族，唐对契丹之策越发不振，这样的情况几乎达二十年之久。武后万岁通天元年，由于营州陷于契丹，营州都督退到幽州东北的渔阳城寄治，由此看来也可以推察出唐朝如何长期地不能对契丹取活跃的政策。这是一因在武后之后发生了韦后（中宗之后）事变，唐廷的内政发生了动摇；二因突厥的威力强大，唐不得不专门顾虑于那一方面。然而营州在地理上是唐朝通向辽东方面的要冲，又是统御东北诸部族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锁钥。玄宗即位之时，虽然在东北的东部兴起了渤海国，然而关于东北方面的经略，唐朝采取了把这个新兴的国家引诱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方面的这样一种必要而又为有利的方略。在执行这一方略时，唐和渤海国的交通除了经由辽东半岛东面的海道之外，又有经由营州的陆路，此事从贾耽的《道里记》可以知道（参照《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三八〇页和四一七页）。为了控制远方的渤海国利用营州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为了压制近处的契丹掌握这一地点也是重要的。唐朝采取了重要的方针政策，因而唐的势力又确实伸展到东北方面，即从侧面牵制正北方的民族，这对阻止其侵略也是有利的措施。

对唐朝的政治进行廓清并正在奋发图强的玄宗，意在恢复营州，同时想补偿以前冷

陁的失败。以前对契丹方面持稳重方略的薛讷也在开元初期看到了“契丹，奚，突厥连合数入边”（《新唐书》卷一一一薛讷传），认为经略东北必须恢复营州，请求征服契丹，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以薛讷主其事。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七月，唐军虽然从檀州（现在的北京市密云县）出击契丹，但在滦水谷地之战大败，薛讷幸而逃归。然而这一失败并没有达到使玄宗的企图受到挫折的程度，在这一年，玄宗置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幽州节度使^⑤），统辖幽、易、平、檀、妫、燕六州，不外是为了在东北边军事行动得以敏捷灵活的一种措置。玄宗时代的节度使有防守某一方面边境的任务。为了执行这一任务，由自己来管辖诸州的军政大权固不待言，还能左右其民政和财政，成为有生杀特权的最高卫戍司令官。设置它的目的在于使边境的军事行动敏捷灵活，希望防备的坚实与兵威的伸张并行。《旧唐书》地理志总序中说，幽州（即范阳）节度使负有“临制奚契丹”的任务。

当时北方塞外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唐的变化。衰老的默啜可汗的权威渐趋没落，突厥的诸部中归服于唐的渐渐地多起来，到了开元四年，默啜被杀，部落离散，突厥的势力瓦解。同年八月，契丹酋长李失活（李尽忠的从父弟）降唐，被封为松漠郡王兼松漠都督，与此同时，奚的酋长李大酺也降，被封为饶乐郡王，任命为饶乐都督，实际上可以说是奚和契丹在免除了突厥的压力后不得不重新仰仗唐的势力以自觉地掌握自己命运的结果。玄宗之父睿宗之时，突厥的压力完全抑制了奚和契丹，给唐的经略增加了很大的障碍。现在突厥瓦解，接着默啜而立的毗伽可汗对唐采取顺从的态度，唐对东北的经略不再如从前受妨害那样，形成了得以进展的形势。

恢复了松漠、饶乐二都督，任命李失活为经略大使（《辽史》卷六三世表，《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四年条的注），虽然不过本着例行的怀柔手段施行了所谓羁縻政策，可是开元五年（公元七一七年）^⑥三月，复立营州都督于柳城，置平卢军^⑦，管内的州县镇戍皆复其旧。玄宗的企图获得成功，唐恢复了经略东北的据点。营州复置之时，玄宗下诏说：“国家往有营州，兹为虏障，此北狄不敢窥视，东藩由其辑睦者久矣”（《册府元龟》卷九九二），真是一语道破了营州的重要地位。当时统制奚和契丹的权限在幽州节度使之手，营州都督属之，负有直接监视这些部族的任务。安东都护没有退到平州去，后来（开元二十年）属于幽州节度使的令下实在不过是一种愚蠢的行动。同年十一月，唐廷以永乐公主妻李失活，也是以婚姻作为怀柔的手段。营州恢复以后直到安禄山大乱约有四十年。现在考察一下在这期间北面的一般形势和奚契丹的动态，从而触及安禄山大乱和乱后形势的变化。

开元六年，“松漠郡王李失活卒，（玄宗）降书于契丹衙官静拆军副大使可突干^⑧，”命其与营州都督宋庆礼合谋备突厥的侵犯。并且降谕旨以“敦（其对唐的）旧好”（《册府元龟》卷九九二）。不幸的是玄宗的谕旨没有生效，丹契的动乱由可突干之手酿成。李失活卒，弟李娑固代之，可是在开元八年，与部下可突干发生争执，被击败而奔营州。营州都督许钦澹命令安东都护薛泰与奚王李大酺一起攻可突干。娑固、李大酺败死，薛泰被生擒，许钦澹也退入渝关（参照《满州历史地理》第一卷三七二至三七六页），形势很危急。然而可突干也知道与唐争并非得策，乃立娑固的从父弟李郁干为主，向唐谢罪了事。十二年，李郁干卒，弟李吐干虽继立，可是又与可突干不和。十三年，李吐干奔唐不复还。可突干立李尽忠之弟李邵固为主。可突干的权势日炽，凌驾于

其主之上。唐仍然执行宽容他的方针，这却助长了可突干自负的念头，他替李邵固向唐朝贡之时，由于没有受到礼遇快快而去，因而产生了决意背叛的动机。开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五月，可突干杀其主李邵固，率契丹和奚的部众降突厥，奚王李鲁苏奔唐。唐的皇族忠王浚作为河北、河东两道的行军元帅受命进军征讨，结果他按兵不动，拖到了第三年还未发军。开元二十年正月，信安王禕为河东、河北行军大总管，裴耀卿副之，他们共同讨伐奚和契丹。幽州节度使赵含章进而与敌战，大败^②，被平卢先锋使乌承玼救之，敌人逐渐深入南下。三月，信安王禕与敌在薊州附近^③战，大获全胜，降服了酋长李诗琐高以下奚众五千余帐^④。然而这一成功不是对契丹的决胜战，因而以后契丹仍然侵寇不止，第二年即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率唐军与投降的奚人共讨契丹，战于渝关之北的都山（参照《满州历史地理》第一卷三七五页）下，奚众叛逃，唐军被得到突厥援助的可突干击破，陷于几乎全军覆灭的不幸。

在此之前，开元二十年，幽州节度使新管领卫、相、洛、贝、冀、魏、深、赵、恒、定、邢、德、博、棣、营、郑十六州，也统辖安东都护府（据《资治通鉴》），其权力较过去增加，颇为强大，这是由于唐廷对东北方面的顾虑加大的原因。郭英杰痛招失败之后，唐廷感到不安，擢在唐的西边屡显战功的张守珪来处置契丹。铨选的苦心没有落空。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逐渐压迫之，可突干苦之，愈益移向西北依赖突厥。可突干的同僚李过折^⑤变心，急袭可突干，一并杀害了可突干所拥立的契丹主屈烈^⑥和可突干来降^⑦，这是该年年末的事。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正月，李过折奉唐廷之命做了松漠都督，当年被可突干的余党泥礼所杀。这时，唐廷对泥礼执行了宽大政策，允许其辩解，并任命他为松漠都督，因而从可突干离叛以来对契丹的处置也暂告结束。

唐廷对泥礼是如何处置的，两《唐书》不详，《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考异说：“今据《张九龄集》有此《赐契丹都督涅礼（泥礼）敕》，又有《赐张守珪敕》云：涅礼自擅，难以义责，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无它也。”据此可以确定唐廷并未加罪泥礼，还拜他为松漠都督。实际上《新唐书》契丹传没有揭出泥礼之名，只是仅仅记了李过折被可突干的残党所杀，《旧唐书》的契丹传将该残党明确记载为泥礼。

《辽史》卷六三世表说泥礼立阻午可汗，阻午可汗就是后来在天宝四年娶唐公主的李怀秀（见后面），没有记泥礼做松漠都督，也不见于《册府元龟》。可突干是长期抗唐的罪魁，然而及至其死，唐廷赠他为“左卫将军”（《册府元龟》卷九七五），由此可见玄宗对契丹所执行的政策是采取了宽大主义。对泥礼也用同样的主义，其态度是并未追究他杀李过折的罪责，以怀柔为宗旨而授以松漠都督。《资治通鉴》的判断是得当的。

《通鉴》又说，开元二十三年，“突厥寻引兵东侵奚、契丹，涅礼与奚王李归国（《热河志》卷一〇五指出，在《张九龄集》有敕奚都督李归国书二篇，《新唐书》、《旧唐书》均未载此人。李归国这个大王是一个作为奚王而任饶乐都督的）击破之。”盖因泥礼也看到突厥的威势已衰，认为依靠唐朝为得策。如果根据《辽史》的世表，泥礼在耶律俨《辽史》中写作涅礼，在陈大任《辽史》作雅里，都说是辽太祖的始祖。泥礼是否是辽太祖的始祖，如果不在其它方面找到证据是不能深入探讨的，只是《辽史》频繁地颂扬泥礼，说他自己不做契丹主，把位子让给遥辇氏的首君阻午可汗而辅佐之。根据前面的叙述可以明白，这是违背事实的。况且《辽史》把阻午可汗这个人比定为李怀秀的

论据甚为暧昧，阻午可汗的经历几乎完全不明，此事将在下面一节深入论及。

可实干叛唐，欲倚赖突厥。当时的突厥主是毗伽可汗，得其弟阙特勤的辅佐，致使突厥强盛而中兴。开元十三年，唐使来时，肆无忌惮地骄傲地对唐使说：“吐蕃狗种，……奚及契丹旧是突厥之奴也”（《旧唐书》突厥传）。实际奚和契丹被突厥征役也是很久了。毗伽可汗和阙特勤都认为与唐抗争是不得策的，与其这样莫如着意于和亲。开元十九年，阙特勤卒，玄宗立即向可汗赠弔书^⑤；第二年为之建碑^⑥，其铭文有“尔道克顺，谋亲我唐”之句，接着毗伽歿，玄宗亦为之建碑^⑦，表彰其忠顺，由此看来，可以推察出唐和突厥已经缔结了很和好的关系。契丹对过去的默啜可汗和现时的毗伽可汗同样期待是不能的。毗伽歿后约十年，突厥已衰，契丹失去了抵抗唐朝的有力的后援者。西方的突厥已不足恃，当时的契丹为了摆脱唐朝的压迫，想到了东方的大国渤海。开元十四年，近于渤海北边的黑水靺鞨未经渤海介绍就直接与唐交通，渤海王大武艺猜疑，击靺鞨。弟大门艺谏之，说招唐怒不利。不听。大门艺觉得自身危险，奔唐乞求保护。从此，大武艺怨恨唐朝庇护大门艺，而唐又帮助大门艺，开元二十一年，从幽州出兵讨渤海，别命新罗从南方威胁之，这些都无效而止。契丹的可突干抵抗唐朝有利的状况实在是在此时，此时的渤海做了契丹的有力后援，感到轻唐的痛苦。然而渤海不是好战之民，而是热爱和平国交的国度，不仅没有向西方开拓领土，同唐的冲突也不是其国是，这据《新唐书》和《旧唐书》的渤海传也能推察出来。从大武艺之时，渤海企图向东北方扩张领土。开元二十六年，大武艺卒，大钦茂立，在此王时代，国都从中京（见《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四〇九页）移往上京（同上，四一〇页），又一度移往东京（同上，四一三页）。后来在大仁秀时代，讨伐海北诸部，大开境宇。如果考察一下这些事迹，可以推断出渤海主要是向东北方发展遂成为海东盛国，并没有怀有进出于西方的辽河平原的企图。大武艺以弟大门艺之故而怨恨唐朝，于开元二十年寇登州（现在地名同，在山东省北岸）也不过是为了泄一时之愤，并不想坚决与唐相争，形势如此，契丹难于依赖渤海对付唐朝，唐朝关于压制契丹深恐渤海妨害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

因此，北边的形势有利于唐对付契丹叛乱的方略，平定叛乱的首功当归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张守珪凯旋，玄宗授之以侍中（《新唐书》卷一二六张九龄传），由此可见，玄宗是如何满足于他的成功。接着在开元二十五年，张守珪破契丹的余党于捺禄山^⑧；二十七年，在他的命令下，平卢军使乌知义（勉为其难地）向潢水之北讨伐叛奚的余党^⑨。不幸，乌知义没有成功，张守珪由于隐匿其败状，被免去幽州节度使之职。然而后来使唐对契丹经略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枭雄却在张守珪的部下中被培养起来，这个枭雄不是别人，就是安禄山。

七、唐朝玄宗天宝年间的契丹

安禄山，《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说“营州柳城胡也”，《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也说“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安禄山事迹》^⑩卷上亦说“营州杂种胡”。安禄山的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之巫，无子祷于战斗神^⑪而生安禄山，这种传说的真伪虽不能详，但若根据他是营州内杂种胡的说法，安禄山是属于奚或契丹中的哪一民族呢？恐怕是属于契丹种。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爱安禄山的骁勇而录用之，多次讨契

丹，以军功而把他进为平卢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讨伐叛乱的奚和契丹之时，因轻敌而失败，张守珪没有按军法斩之，因惜其骁勇，进而把他护送到京师长安。玄宗也惜其才竟赦免了他。开元二十七年，张守珪被贬之后，安禄山在平卢军（在营州）。开元二十八年，做了平卢军兵马使。凡是朝廷的官员至平卢者，安禄山都厚赂他们来为自己吹嘘，致使玄宗越发信爱安禄山。开元二十九年（公元七四一年），任命他做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两蕃就是奚和契，以前者的酋长为饶乐都督，以后者的酋长为松漠都督，称渤海王为忽汗州都督，任命黑水靺鞨的酋长为黑水都督，因此称为四府（都督府），安禄山兼其经略使，享有在东北方面全盘经略者的荣誉。

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在平卢置节度使^②，首先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安禄山。天宝三年，他又兼任范阳节度使，范阳即幽州。现在根据《旧唐书》地理志总序看一下那时的平卢、范阳二节度使负有什么任务，又握有多少兵力。（一）平卢节度使治营州，带有镇抚室韦和靺鞨的任务。室韦是散居于现在中国北部黑龙江省方面的大民族。靺鞨包括黑水靺鞨和以粟末靺鞨为中心的渤海国。在其节度使指挥下有平卢军（在营州城内，兵一万六千人）、卢龙军（在平州城内，兵一万人），渝关守捉（兵三千人）和安东都护府（兵八千五百人），管领的区域相当于营州及平州境内。（二）范阳节度使治幽州，其任务在于临制奚和契丹。其指挥下有经略军（在幽州城内、兵三万人）、威武军（在檀州城内、兵一万人）、清夷军（在妫州城内、兵一万人）、静塞军（在蓟州城内、兵一万六千人）、恒阳军（在恒州城内、兵六千五百人）、北平军（在定州城内、兵六千人）、高阳军（在易州城内、兵六千人）、唐兴军（在漠州城内、兵六千人）和横海军（在沧州城内、兵六千人），管辖的领域相当于幽、蓟、妫、檀、易、定、恒、漠、沧九州的境内。

营州是唐在东北方面的交通要冲，又是唐在东北方面经略奚和契丹的据点，其位置尽管重要，可是过去常常被契丹威胁，现在在其地置节度使，授与遥控室韦和靺鞨的任务，使唐在东北面经略上有了显著的发展。我们可以推断出，以前长期龟缩到长城以内的安东都护府再次向北推进，也是这一发展的结果。这个都护府先前从辽东方面后退，置于平州，可以看做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到了天宝初期^③，迁到了北方的辽西故郡城。根据我的考证，辽西故郡城在唐代营州的东方即现在的大凌河边（《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四〇五页）。这是安东都护府最后的所在地。唐对东北方面的势力最终发展到这种程度，主要是由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适当地运用节度使的职权收到了成效，与此同时还由于以前作为奚和契丹后援的突厥的威力大大地衰弱了。天宝元年之时，突厥衰微的征兆明显起来。天宝三年，其国几乎崩溃。天宝四年，突厥的白眉可汗被回纥的怀仁可汗所灭。回纥代之而成为北方的强国。由此可以窥知还在开元天宝之际唐对突厥已无必要深加顾虑的形势。安禄山出自张守珪的部下，在张守珪成功之后，他兼任平卢、范阳二节度使而掌握东北重镇。安禄山对奚和契丹持什么态度是下面应该说的课题。

在此之先，开元二十三年，唐廷执行宽容的方针，任命契丹的泥礼为松漠都督，由此之后直至天宝四年的十年间，契丹的动静不详。设平卢节度使，使唐在东北的经略进一步得以发展，如果这是在这一时期的事，则说明契丹在其时大体上服从了唐朝。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天宝“二年正月丁卯，契丹刺史匍从之等一百二十人、奚刺史

达利胡等一百八十人并来朝，册勋皆授中郎将，赐紫袍、金钿带、金鱼袋”。从契丹主和奚主直接朝贡也可窥见奚和契丹服属之一端。至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唐以静乐公主妻契丹大酋李怀节。《新唐书》和《旧唐书》的玄宗纪均作李怀节，《册府元龟》卷九七九和《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年条与此相同；《新唐书》的契丹传把他说是李怀秀，《文献通考》卷二四契丹传和《辽史》卷六三世表与此相同。世表中还说李怀秀是唐赐的姓名，契丹名迪鞞俎里。实际上，所谓契丹遥辇氏的首君阻午可汗者就是这个人，但不知究竟是怀秀还是怀节。《新唐书》契丹传还说，是年李怀秀降唐，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又赐公主。《新唐书》和《旧唐书》玄宗纪、《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诸书都没记他来降，只说赐公主。《辽史》世表说，以前，泥礼曾立他为契丹主。从泥礼至李怀秀之间，契丹主继袭的次序虽然甚欠明瞭，不过从前面所述的形势来推察，说李怀节新来投降是不妥当的。

奚的状况又如何呢？在此之前，开元二十年，奚的首长李诗也降唐。据《新唐书》奚传，李诗之子李延宠又与契丹叛，被张守珪所困而降唐，拜饶乐都督怀信王，赐宜芳公主，降服的年代不明。只是赐公主的时间与契丹李怀节的赐公主时间相同，都在天宝四年三月，此事虽见于《新唐书》和《旧唐书》玄宗纪，然而降服是否也是同年的事则不明。契丹的可突干动乱以后，奚反抗唐朝甚于契丹，由此也可认为，李延宠之降可能是张守珪在幽州节度使任内的事，现在唐廷从策略上把它放在与契丹均等的地位，都赐以公主。《旧唐书》玄宗纪说，开元二十二年九月，“改饶乐都督府为奉诚都督府”（这个名称长期被使用，《新唐书》地理志把这一改名记为开元二十三年）。同年六月，张守珪大破契丹，奚的李延宠也在其时降唐，因而给与奉诚之名^④。

天宝四年三月，奚主和契丹主主都受唐赐公主的恩惠，理应高兴，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同年九月，奚主和契丹主都分别杀公主而叛唐。《新唐书》安禄山传把此事说成是由于安禄山“幸邀功，肆其侵〔奚和契丹两蕃〕”所致。安禄山欲献媚玄宗，所以想立功，诱契丹人来饮酒，在酒中下毒药，把人毒死之后斩其首而献之唐廷，欲得恩赏。据《新唐书》和《旧唐书》安禄山传的上述记载，他经常凌辱奚和契丹，招来了奚和契丹的怨恨应是事实。

安禄山讨破两蕃的第二年即天宝五年四月，唐廷另立李楷洛^⑤（《新唐书》契丹传和《资治通鉴》作楷洛，《文献通考》契丹传作楷落，《册府元龟》卷九六五作楷雒）为松漠都督恭仁王，立李娑固为饶乐都督昭信王，两蕃暂时得到镇抚。

天宝十年（公元七五一年）二月，安禄山任河东节度使。他现在兼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气焰益盛。他试图恃其强大的兵力威压契丹，以前肆无忌惮地迫害两蕃，现在这么做也是当然之势。他首先诱奚，以其一部为向导。同年八月，率兵六万，从平卢向西至土护真河，更强行军三百里，至潢水之南的契丹牙帐掩击之。土护真河就是现在的老哈河，潢水是现在的西喇木伦河，契丹的牙帐在现在的老哈河下游与西喇木伦河会河处附近^⑥。安禄山大败，仅以身免而投平卢。第二年即天宝十一年三月，安禄山再举大军击契丹，欲雪去秋之耻，理应跟从一起去征讨的突厥降将阿布思与安禄山不睦，叛去漠北，征讨于是未果而止。阿布思后来被回纥所破，诱其部落降安禄山，阿布思作为同罗部族^⑦（古代铁勒之别部）的酋帅，曾仕突厥，安禄山得其部众，兵力益加精强。

安禄山贪图功名而胁迫奚和契丹，天宝十年，攻契丹牙帐失败后的情况，《新唐